

# 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城镇 居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以厦门市海沧区为例

王 晶

**【提 要】**本研究以厦门市海沧区为例,利用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城镇居民社会融合的影响。海沧区目前属于中等居住隔离程度,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本地人口来说,居住区位对其社会融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乡的维度上,城乡结合区、镇、村庄依然在社会融合水平上高于主城市区;而对外来人口来说,居住隔离对其社会信任水平和公共参与都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目前城市社会对外来人口在形式上的放开还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关键词】**居住隔离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社会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4-0082-09

## 一、引言

快速城市化是近年来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规模为4.59亿;到了2015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规模增加至7.71亿,人口累计增长接近6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一些特殊性,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遗产还没有彻底突破,大量城乡人口及城市间流动人口因为户籍等原因不能在城市获得社会保障、住房、义务教育及公共服务。相对于城市原有居民,外来人口的收入水平更低,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也更低,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较低。在西方社会中,少

数弱势族群集聚已经发展成为难以治理的社会问题,如果居住隔离在我国城市中形成,那么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人群身份差距将因此而长期固化。少数特殊群体聚居,信任、冲突等问题可能会因某些社会问题而触发,极易在相互影响中形成群体性事件。

在传统熟人社会,无论是从社会信任、社会互动,还是从社区参与的角度来看,社区融合都是社区存在的最根本要素。进入市场化时代,农村人口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来到城市居住空间,由于户籍制度门槛,城乡二元的结构壁垒开始在城市复制,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在居住空间上开始出现差异,外来人口更多地聚居在城乡结合区、城郊地区,而本地人口

开始向城市中心区集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更加“绝缘”。外来人口通常互相抱团取暖，他们之间的交往、支持远高于其与本地人口之间的交往、支持。

厦门市海沧区是一个年轻的区，1989年获批成为台商投资区，2003年设立行政区。海沧区人口并不多，但是外来人口比例较高，2014年底全区总人口429159人，本地人口155765人，暂住人口273394人。<sup>①</sup>虽然海沧区自2011年以来连续四年将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投向民生事业，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和对外来人口的开放政策更是较为优厚，使得该区在城乡居民收入、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等方面都位居全省前列，但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凸显，特别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融合问题不断浮现出来。本文拟以海沧区为例，基于其现有的居住特征，探讨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

## 二、文献回顾

在与合著的《种族、社区与冲突》(1967)中，雷克斯提出了“住宅阶级”的观点。他认为，居住空间分布对不同阶层的融合有重要影响，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拥有不同住宅的人形成了不同的“住宅阶级”：一是通过现金在优势区位直接购买住宅者；二是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购买该类住宅者；三是通过抵押贷款方式拥有住宅但住宅位置不佳者；四是住在政府出租的住宅者；五是住在私人出租的住宅者。整个城市被划分为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各阶层间社会隔阂严重，这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骚乱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②</sup>

在我国城镇化和住房市场化过程中，居住隔离的倾向也在逐步显现，特别是在人口聚居的大城市，其居住隔离的趋势更加明显，农民工和本地被征地农村户籍人口聚居于“城中村”或“棚户区”，低收入群体聚居于公租房、廉租房社区，中等偏低收入群体聚居于经济适用房社区，中上收入群体聚居于高档社区，高收入群体主要聚居于别墅区和高档住宅区。大城市

在居住空间上的隔离正在逐步形成。周大鸣提出城市社会存在“二元社区”，珠三角外来工或居住于当地农民房、或居住于宿舍，而本地人则居住在设施较好的小区，“地方本位”政策和“寄生”经济是导致二元模式的根本因素。<sup>③</sup>王桂新等通过对上海外来人口居住“生态”的研究，发现上海外来人口主要聚居于“城中村”、“棚户区”，形成了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的“孤岛”。<sup>④</sup>张展新等研究发现，即便居住在同一社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还是存在居住隔离，村委会社区比居委会社区居住隔离更为严重。<sup>⑤</sup>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居住隔离指数”来衡量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黄友琴等利用“五普”抽样数据对武汉市的研究显示，2000年武汉市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隔离指数在0.20~0.25之间，近郊区外来移民居住隔离程度严重，达到0.51~0.62。<sup>⑥</sup>孙斌栋等利用2006~2007年上海市住房租赁价格数据研究发现，上海市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隔离指数分别为0.87和0.56，这意味着该市顶层社会严重隔离，而底层社会聚居现象显著。<sup>⑦</sup>

居住隔离对非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但在现有研究中从居住隔离的视角探讨社会融合问题的文献并不多。罗仁朝等研究发现，居住于城市郊区、人口聚居区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对社区事务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良好的期望，具有更好的社会融合度；而居住于城郊边缘带的流动人口的社会

① 厦门市海沧区统计局编：“厦门市海沧区2015年统计年鉴”，第186页。

② 转引自夏建中：《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③ 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④ 王桂新、张得志：《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5期。

⑤ 张展新等：《城市社区中的流动人口——北京等6城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⑥ 黄友琴、易成栋：《户口、迁移与居住分异——以武汉为例的实证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6期。

⑦ 孙斌栋、吴雅菲：《上海居住空间分异的实证分析与城市规划应对策略》，《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融合度则较低。<sup>①</sup> 马西恒等通过对上海市某社区的深度考察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sup>②</sup> 杨菊花等使用2014年八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调查”数据,从宏观、社区和个体三个层面聚焦居住隔离现象的基本特征及相关要素,分析结果发现,半数流动人口面临居住隔离问题;自我选择对居住隔离固然重要,但不同层面的制度、经济和住房结构的束缚和桎梏更为强大。<sup>③</sup> 沈洁通过在上海市展开的随机问卷调查,考察定居郊区对移民融入城市所产生的区位效应。研究发现,郊区移民不仅在收入上低于中心城区移民,而且建立群际间的社会关系的机会也显著降低。<sup>④</sup> 任远等利用2013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关系的角度研究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路径,指出只有增强城市的发展性,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提供更多的教育、就业和发展机会,提升其社会流动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客”矛盾和实现社会整合。<sup>⑤</sup>

### 三、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变量描述

#### (一) 数据来源

2015年,笔者参加的课题组以“海沧共同缔造研究”为主题进行抽样调查,采用三阶段按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在海沧区所有社区和行政村中抽取8个社区、7个行政村,总样本数为1032个,其中流动人口422个,约占总样本量的40.89%。如前文所述,海沧区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典型的现代化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既包含了本地人口的非农化过程,也包含了外来人口的本地化过程。在人口结构上,海沧区外来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非常高,在社会融合上面临着与其他东部城市相一致的问题。因此,本文的分析虽以海沧区为例,但颇具典型性,对与其人口结构相似的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 (二) 计量模型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城市居住隔离对社会融合造成的影响,需要先分别测量城市居住隔离程度和城市社会融合程度,在此基础上,再探讨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使用局部居住隔离指数来衡量社区内部的居住隔离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sup>⑥⑦⑧</sup>

$$D_i = \left( \frac{x_i}{X} - \frac{y_i}{Y} \right) * 100$$

其中, $D_i$ 为局部居住隔离指数,表示区域*i*内两个群体的相互居住隔离程度,其取值范围从-100到100。取值为0,表示两个群体人数按全市人口比例在区域内均匀分布。取值大于0,意味着群体*x*相对于群体*y*而言,在本区域更加过度聚居(more over-concentrated),或说“超配”(over-represented);取值小于0,则反之。-100和100表示两个群体完全隔离的两种极端情况,100代表全市的群体*x*全部聚居在本区域而群体*y*则一个都没有;-100表示全市的群体*y*全部聚居在本区域而群体*x*则一个都没有。

本文对于社会融合程度的测量采用了三个维度,即社会信任、公共参与和非正式社会互

① 罗仁朝、王德:《上海市流动人口不同聚居形态及其社会融合差异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08年第6期。

② 马西恒、董星:《敦睦他者: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学海》2008年第2期。

③ 杨菊花、朱格:《心仪而行离: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居住隔离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④ 沈洁:《当代中国城市移民的居住区位与社会排斥——对上海的实证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9期。

⑤ 任远、陈丹、徐杨:《重构“土客”关系: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发展性社会政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⑥ Wong, D. W. S., Enhancing Segregation Studies Using GIS.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Vol. 20 (2), 1996, pp. 99-109.

⑦ Wong, D. W. S.,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Issues in Incorporating Segregation Measurements in Hedonic Price Modeling. In Baranzini, A., et al eds., *Hedonic Methods in Housing Markets*. New York: Springer, 2008, pp. 159-175.

⑧ 陈杰、郝前进:《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居住隔离——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学术月刊》2014年第5期。

动。对于社会信任和公共参与，问卷中有直接的问题与其对应。其中，社会信任问题为“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小区的居民？”，包含“很不信任、一般、信任、非常信任”四个选项，为了分析更简洁，将“信任、非常信任”归并为信任，而将“很不信任、一般”归并为“不信任”，从而形成“社会信任”虚拟变量。“公共参与”问题为“如果有人发动居民解决社区问题，您是否会参加？”，根据调查结果形成“公共参与”虚拟变量。除此之外，问卷设计了一系列关于社区融合的量表，结合本文关注的问题，选取了四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因子分析结果，析出了“非正式社会互动”变量。<sup>①</sup>

对于回归模型，本文同时采用 Logit 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方式，因变量为“社会信任”、“公共参与”和“非正式社会互动”三个指标；自变量为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和空间变量，其中个人空间变量主要包含个人居住的社区类型以及区域内的居住隔离指数。

### （三）变量描述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是社会融合，从总体上来看，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在社会融合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的。在社会信任上，本地人口选择“信任”一般居民的平均比例为 55%，而外来人口选择“信任”一般居民的平均比例为 45%，两者差异显著；在公共参与上，本地人口选择“参加解决社区问题”的平均比例为 76%，而外来人口选择“参加解决社区问题”的平均比例为 65%；在非正式社会互动上，本地人口的得分为 0.07，外来人口的得分为 -0.11，两者差距为 0.18。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区居住隔离程度，海沧区的居住隔离指数为 0.54，按照居住隔离指数划分，属于中等的居住隔离程度。从不同类型的社区来看，主城区是户籍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此类社区户籍人口占总户籍人口比例的 32%，而非户籍人口的比例则相对较低，仅占总非户籍人口的 15%，两者的相异比例为 17；村庄也是户籍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相异比例为 20；位于城乡结合区的社区与主城区和村庄恰恰相反，是非户籍

人口集中居住的区域，城乡结合区的社区聚集了 62.75% 的外来人口，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相异比例达到了 37，已经显现出较高的隔离程度。从总体上来看，传统的主城区还是以原住居民为主，而城乡结合区则聚集了大量的流动人口。

表 1 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年龄结构来看，外来人口平均年龄为 35.74 岁，而本地人口平均年龄为 42.69 岁，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平均年龄低近 7 岁。在教育水平上，外来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众数出现在初中层面上，占比 38.46%；而本地人口的教育结构则相对均衡，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略高于其他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 29.93%。从居住方式来看，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存在显著差异。外来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市场租赁住房，占调查样本的 56.56%；其次为雇主提供住房，占比 17.19%。本地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是自建住房，占调查样本的 61.02%；其次为商品房，占比 28.95%。从居住区位类型来看，本地人口居住区位的前两位为村庄和主城区，分别占比 42.95% 和 26.23%；外来人口居住区位的前两位为城乡结合区和主城区，分别占比 37.44% 和 19.9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地人口		外来人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社会信任	0.55	0.49	0.45	0.49
公共参与	0.76	0.42	0.65	0.47
非正式社会互动	0.07	0.04	-0.11	0.05
居住隔离指数	0.54	0.17		
男性（女性=0）	0.49	0.50	0.52	0.50
年龄	42.69	13.43	35.74	11.38

<sup>①</sup> 问卷中有四个问题，分别为：1. 您有事是否经常征求邻居的意见？2. 您是否可以顺利从邻居家借到需要的东西？3. 如果您有一天要出远门，能不能麻烦小区其他居民帮您收快递、带宠物、收报纸等？4. 过去三个月，您是否从邻居那里得到过帮助？这四个问题均为虚拟变量，析出一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1，为 2.768，解释了总体 65.03% 的方差，KMO 值为 0.822。根据因子负载值结果，该因子体现为“非正式社会互动”。

续表

	本地人口		外来人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婚姻(未婚/离婚/丧偶=0)	0.86	0.34	0.80	0.40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25.82		16.29	
初中	20.89		38.46	
高中/职高	23.36		26.70	
大专及以上	29.93		18.55	
家庭收入(对数)	11.30	1.28	11.02	1.41
党员(非党员=0)	0.12	0.33	0.06	0.24
单位类型(%)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16.45		2.71	
国有企业	10.69		8.60	
私营/合资/集体企业	38.16		61.54	
个体/家庭经营/自由职业	34.70		27.15	
居住方式(%)				
自建住房	61.02		8.14	
商品房	28.95		14.48	
雇主提供住房	2.63		17.19	
市场租赁住房	5.10		56.56	
保障房、亲属借宿等方式	2.30		3.62	
居住区位类型(%)				
主城区	26.23		19.91	
城乡结合区	21.80		37.44	
镇中心区	5.25		13.74	
村庄	42.95		10.66	
工厂区	3.77		18.25	
观测值	608		422	

#### 四、实证分析

不同类型的人口在社会融合程度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上文我们也看到,本地人口的社会信任与公共参与的比例比外来人口更高,同时非正式社会互动具有比外来人口更高的得分。本地人口世代聚居此地,在本地的社会、文化、社区公共参与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于不同类型

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影响,我们分人群分析个体因素和空间因素对于不同社会融合指标的影响。

(一)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本地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

下文主要从两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一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包括教育、单位、住房等;二是空间因素,包括居住地类型、居住地内部隔离水平。

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本地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来看,在社会信任的回归结果中,国有企业、私营企业<sup>①</sup>和个体经营<sup>②</sup>的受访者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比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更低。相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私营企业员工选择“信任”的可能性降低62.6%,个体经营人员选择“信任”的可能性降低55.2%。在公共参与的回归结果中,相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私营企业员工公共参与的可能性降低80.3%,个体经营人员公共参与的可能性降低69.3%。在非正式社会互动的回归结果中,居住在市场租赁住房的人口与社区居民进行非正式社会互动的程度显著降低,相对于自建住房人口,居住在市场租赁住房的人口非正式社会互动的水平降低58%。

空间因素对本地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具有显著影响。在社会信任的回归结果中,相对于主城区居民,镇中心区、村庄、工厂区居民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更高。其中,镇中心区居民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1.8倍左右;村庄居民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1.1倍左右;工厂区居民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4.2倍左右。在非正式社会互动的回归结果中,在镇中心区和村庄居住的人口非正式社会活动的程度更高。相对于主城区居民,镇中心区居民非正式社会互动的水平高57.1%,村庄居民非正式社会互动的水平高61.4%。而区域内部居住隔离水平,无论是对社会信任、公共参与,还是对非正式社

<sup>①</sup> 此处私营企业笼统地代指私营/合资/集体企业。

<sup>②</sup> 此处个体经营笼统地代指个体/家庭经营/自由职业。

会互动，均没有显著影响。

综合以上回归结果，对本地人口而言，虽然经历了城市化过程，但镇中心区和村庄原住民之间还保有原先的熟人社会关系，相比城市社会，信任度更高。很多工厂区都是以村和乡镇为单位的，厦门地区的原住民一般不愿去外地打工，大都进入到附近的工厂工作，企业嵌入在原有的居住空间之内，村企在空间上高度重合，促进了当地社会内部的组织重构，原住民之间有可能在工业化过程中表现出更加团结和信任的特征。因此，越趋向于远离主城区的原住民，其社会信任和非正式社会互动水平反而越高。但是，本文测量的居住隔离对于原住民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原住民的社会融合几乎不受外来人口的影响，原住民信任和非正式社会互动的对象更可能为原住民，外来人口的进入并没有对原住民在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上造成较大的影响。

表 2 居住方式及隔离程度对本地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

	Logit 回归	Logit 回归	多元线性 回归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 社会互动
性别	0.211 (0.199)	0.341 (0.234)	-0.077 (0.082)
年龄	0.003 (0.010)	-0.032*** (0.011)	-0.005 (0.004)
已婚	-0.169 (0.299)	0.940*** (0.336)	0.098 (0.122)
受教育水平（参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226 (0.290)	-0.062 (0.314)	-0.045 (0.116)
高中/职高	-0.407 (0.319)	0.031 (0.372)	-0.015 (0.130)
大专及以上学历	-0.436 (0.367)	-0.096 (0.431)	0.010 (0.149)
家庭收入（对数）	-0.075 (0.076)	-0.113 (0.100)	0.011 (0.030)

续表

	Logit 回归	Logit 回归	多元线性 回归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 社会互动
党员	0.739** (0.305)	0.710 (0.435)	0.014 (0.119)
单位类型（参照组：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0.423 (0.427)	0.419 (0.623)	0.201 (0.172)
私营/合资/集体企业	-0.626** (0.303)	-0.803** (0.388)	-0.021 (0.121)
个体/家庭经营/自由 职业	-0.552* (0.327)	-0.693* (0.404)	0.050 (0.131)
居住方式（参照组：自 建住房）			
商品房	0.536 (0.634)	0.138 (0.760)	-0.038 (0.258)
雇主提供住房	-1.075 (0.847)		-0.132 (0.346)
市场租赁住房	0.221 (0.490)	-0.834 (0.533)	-0.580*** (0.203)
保障房、亲属借宿等 方式	-0.005 (0.725)	-0.667 (0.716)	-0.046 (0.295)
居住区位类型（参照组： 主城区）			
城乡结合区	0.935 (0.676)	-0.358 (0.790)	0.441 (0.275)
镇中心区	1.824*** (0.514)	0.137 (0.598)	0.571*** (0.192)
村庄	1.128* (0.649)	-0.051 (0.766)	0.614** (0.264)
工厂区	4.234* (2.231)	-0.700 (2.673)	0.479 (0.916)
居住隔离指数	-0.027 (0.020)	0.010 (0.024)	0.006 (0.008)
常数项	0.694 (1.243)	3.536** (1.560)	-0.269 (0.501)
观测值	548	535	546
Pseudo R2	0.059	0.074	
R-squared			0.139

注：(1)\*\*\*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2)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3) Logit 回归结果为边际效应计算结果。表 3 同。

## (二) 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

本文对外来人口也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和空间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上,受教育水平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影响显著,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外来人口在社会信任、公共参与和非正式社会互动上都具有显著优势,以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为参照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外来人口选择“信任”的可能性高1倍多,公共参与的可能性高93.1%,非正式社会互动的水平高37.4%。单位类型也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外来人口公共参与的可能性降低近2.3倍。

空间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与对本地人口的影响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社会信任的回归结果中,城乡结合区居民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1.9倍左右;镇中心区居民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1.8倍左右;村庄居民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1.8倍左右;工厂区居民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最高,比主城区居民高近7倍。在公共参与的回归结果中,城乡结合区居民公共参与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98.8%;镇中心区居民公共参与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89.5%;村庄居民公共参与的可能性比主城区居民高1.2倍左右;工厂区居民公共参与的可能性最高,比主城区居民高5.6倍左右。在非正式社会互动的回归结果中,村庄居民与主城区居民的差异最为显著,村庄居民非正式社会互动水平比主城区居民高75.5%。

居住隔离指数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具有显著影响,这是与本地人口最大的差异之处。从回归结果来看,居住隔离指数对社会信任和公共参与具有负向的影响。其中,在社会信任上,居住隔离指数的边际效应为-0.050,意味着居住隔离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信任可能性降低5%;在公共参与上,居住隔离指数的边际效应为-0.045,意味着居住隔离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公共参与可能性降低4.5%。

综合来看,空间因素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

合程度影响更强,无论是从居住地类型还是从居住地内部的分割水平来看,皆是如此。相对于主城区的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区、村庄、工厂区居住的外来人口的社会信任、公共参与和非正式社会互动的程度都有显著增强,特别是工厂区的外来人口,在社会信任与公共参与两方面的社会融合程度都是最高的。由此可见,外来人口的集聚有助于其自身的社会融合,外来人口在打工地对于自身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构,这种重构可能更多地来源于外来人口内部,而非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所以,在回归结果中体现出来的是,在外来人口越密集的地方,社会融合程度越高。这一影响同样延伸到社区内部的隔离程度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上。在本地人口的回归结果中,居住隔离对于本地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基本没有影响,而对外来人口来说,居住隔离对于社会信任和公共参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负向的,意味着居住隔离确实造成了外来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进而引致其对社会信任和公共参与上的退缩,这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治理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表3 居住方式及隔离程度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

	Logit 回归	Logit 回归	多元线性 回归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 社会互动
性别	0.125 (0.240)	0.204 (0.251)	-0.189 (0.119)
年龄	0.016 (0.012)	0.003 (0.012)	-0.007 (0.006)
已婚	0.163 (0.354)	0.443 (0.363)	0.349** (0.176)
受教育水平(参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467 (0.358)	0.334 (0.358)	0.259 (0.178)
高中/职高	0.758* (0.403)	0.476 (0.409)	0.236 (0.199)

续表

	Logit 回归	Logit 回归	多元线性 回归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 社会互动
大专及以上学历	1.050** (0.450)	0.931** (0.468)	0.374* (0.223)
家庭收入（对数）	-0.043 (0.090)	-0.074 (0.099)	-0.025 (0.046)
党员	0.479 (0.419)	-0.120 (0.446)	0.179 (0.208)
单位类型（参照组：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0.107 (0.846)	-2.269* (1.186)	-0.353 (0.424)
私营/合资/集体企业	-0.020 (0.726)	-1.384 (1.107)	-0.023 (0.362)
个体/家庭经营/自由 职业	0.356 (0.749)	-1.518 (1.126)	-0.067 (0.375)
居住方式（参照组：自 建住房）			
商品房	0.909 (0.621)	1.092* (0.628)	0.607** (0.303)
雇主提供住房	0.302 (0.572)	0.393 (0.592)	0.032 (0.286)
市场租赁住房	0.296 (0.491)	0.245 (0.485)	0.246 (0.242)
保障房、亲属借宿等 方式	0.400 (0.749)	0.451 (0.779)	0.103 (0.371)
居住区位类型（参照组： 主城区）			
城乡结合区	1.907*** (0.524)	0.988** (0.503)	0.379 (0.246)
镇中心区	1.833*** (0.475)	0.895* (0.470)	0.179 (0.226)
村庄	1.846*** (0.529)	1.152** (0.525)	0.755*** (0.251)
工厂区	6.993** (2.846)	5.639** (2.721)	0.921 (1.361)

续表

	Logit 回归	Logit 回归	多元线性 回归
	社会信任	公共参与	非正式 社会互动
居住隔离指数	-0.050* (0.027)	-0.045* (0.026)	0.003 (0.013)
常数项	-3.054** (1.365)	0.969 (1.676)	-0.729 (0.675)
观测值	382	384	380
Pseudo R <sup>2</sup>	0.075	0.056	
R-squared			0.158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厦门市海沧区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着重探讨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居住区位及区域内的隔离程度对城镇居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下面结合这些结论进行讨论。

首先，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乡的维度上。以往有研究提出，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现代社区、陌生人社会对原有的熟人社会是一个逐渐打散的过程，随着居住方式从传统村落居住向现代社区居住的改变，社会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海沧地区虽然也经历了高速的市场化过程，但是相对于城市社会，城乡结合区、镇中心区、村庄依然在社会融合水平上高于主城区。一方面，厦门郊区就地城市化比率较高，原有的村落、乡镇结构并没有被彻底打破，原有的熟人社会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下来，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边缘和村庄地带的原住民在社会信任、公共参与、非正式社会互动方面的水平都比较高。另一方面，本文希望着重讨论的居住隔离并没有对原住民的社会融合产生显著影响，其原有的社会信任和非正式社会互动等更可能对应的是群体内部的熟人社会关系，外来人口虽然在物理空间上进入了打工地，但在社会空间上并没有对原住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强烈影响。

其次,居住区位及隔离程度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与对本地人口的影响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结合外来人口分布的集中度,本文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理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外来人口聚集有助于群体内部的互相扶持和相互融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居住隔离指数对外来人口的社会信任和公共参与水平都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社会排斥本身就会降低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融合,无法达成相互信任;另外,在公共参与上,虽然自2010年开始,在地方居委会选举法中,已经允许外来人口参加居委会选举;同时,地方自治团体也不断吸引外来人口参加,但是外来人口参与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可以想见,如果公共参与本身能够体现外来人口的诉求,解决外来人口的切身问题,那么外来人口的参与积极性不会很低。现在的低水平参与恰恰反映了现实的问题,城市社会对外来人口在形式上的放开还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居住隔离使外来人口更

多地集中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的城市边缘区域,社会自发参与可以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同一地域内城乡之间的城市化过程,二是跨地域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过程。这两个过程交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本地乡村人口依托当地资源和制度优势,已经逐步融入城市社会;而主要问题在于外来人口的城市化融入问题,由于户籍制度、居住隔离及隐形的社会文化因素,外来人口一直处于城市的边缘,被局限于城市的特定空间中。而贫困人群聚居会产生众多的社会问题,可能埋下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因此,必须未雨绸缪,积极推动外来人口实现与当地社会的融合。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任朝旺

## The Influence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and Segregation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Urban Citizens: Haicang District of Xiamen City as an Example

Wang Jing

**Abstract:** The research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ial segment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based on a survey of Haicang District of Xiamen City, which found that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is district remains a moderate residential degree a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 factors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n social integration varies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and migrants.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factors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urban and rural dimensions,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residents living in rural-urban fringe areas, towns and village have higher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than those in the main urban areas. For the migrant population, residential segmen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ocial trust level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t present, the superficial equal policy of urban society to migrant population cannot solve such substantive problems.

**Keywords:** residential segmentation; social trus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formal social interaction